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

郭建宁 主编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QIANYAN
WENTI YANJIU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

郭建宁 主编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QIANY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 郭建宁主编.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4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212-05194-5

I. ①马… II. ①郭…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185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郭建宁 主编

出版人: 胡正义

丛书策划: 胡正义

责任编辑: 汪双琴

装帧设计: 王国亮

特约编辑: 唐 伽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 230071

营销部电话: 0551-3533258 0551-3533292 (传真)

印 制: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75 千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2-05194-5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10

- 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10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从中国的“实境”出发/18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发展创新的过程/38

第二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40

- 一、德赛精神：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思想准备/40
- 二、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基础/49
- 三、党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61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4

-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的探索/74
- 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79
- 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102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32

-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33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二、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50

三、历史经验与创新空间/164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171

一、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71

二、中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起点与丰厚土壤/180

三、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深度结合/195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05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与方法/205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212

三、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213

第七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发展问题的若干分析与对策/219

一、本学科师资知识背景分析/220

二、本学科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情况/226

三、本学科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取向/232

附 录 近十年文化建设的回顾与思考/235

一、近十年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235

二、近十年文化建设的学术探讨/247

三、近十年文化建设的发展态势/256

后 记/258

导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理念,也是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别的专门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是深入探讨其内在关联的著述还不很多,导论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关联,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理论创新,但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别强调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侧重实践创造,但是实践经验可以提炼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受苏联的影响最大,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通过苏联人的“二传”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是向苏联“一边倒”,总体上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影响中国学术大半个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影响中国社会大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最重要的命题,都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和苏联范式的,一是在实践上针对苏联模式,一是在理论上针对苏联范式。当然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个命题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突破苏联模式和苏联范式这一起点的意义和范围了。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的实践体现就是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造的理论结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展开和实践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找到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达到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理论底蕴、理论自觉、理论武装、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加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其中有许多内容本身就是重合的、交叉的、甚至是一体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止境。实践本质的无限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基本完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久前有学者发表文章,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认为,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并且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运用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①这种见解只看到了指导思想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不仅要体现在指导思想层面,还要体现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与文化重建,哲学转型与哲学建构等方面。应当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没有结束。特别是文化转型与哲学建构的任务还很繁重,有的还在起步阶段甚至尚未破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结束,而是仍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结束,而是还有许多工作要花大力气去做。概而言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中国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即既是中国本土的,又是中国大众的。说它是本土

^① 参见常绍舜:《当今主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2006年9月7日《社会科学报》。

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融为一体,说它是大众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哲学。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体现和最终成果,任重道远,我们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实践中提出与形成的,也是在实践中发展与创新的。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此后,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有新的提法和概括,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进一步论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联系,内在契合的相关表述主要有: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

第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里强调的是发展。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里强调的是与时俱进。

第四,“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这里强调的是综合的方法与创新的成果。

第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这里强调的是当代性和中国形态。

第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以上的第一种提法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密不可分的,离开实践这个主渠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第二、三、四种提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和时代性。强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第五、六两种提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相结合,使之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强烈的实践性、浓郁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就是实践特性、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三位一体、有机结合与完整统一。马克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化和时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毫无疑问是主题和基础。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在讲民族性时要把握时代特点,在讲时代性时要体现民族特色,使之在实践中相互交融。总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民族化和时代化。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开拓创新,体现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比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就是讲实践性。比如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这就体现了民族特色。比如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这就反映了时代特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既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又是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新时期和当代中国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和发展动力。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特征,又体现民族特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列宁曾经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存在一个什么统一的模式,也没有一个先验的公式,而是要适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他强调“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他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

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①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具有共同的本质和特点。但是由于具体条件不同,不同国家又会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形式和特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话题围绕中国展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十分艰巨的国内改革攻坚。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性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深化改革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总之,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国内面临改革的深化,既是“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现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风险高发期”。国际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经济联系紧密,既是“深度依存期”,又是“摩擦频发期”。为此,我们必须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要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解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改善民生上。

最后,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探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清醒地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十七大报告的主题。而提出并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十七大报告的一大亮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与论述,立意高远,富有创意。不仅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认同与高度评价,同时也是理论界深入研究的紧迫任务和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新篇章、新境界。对这个体系我们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一,必须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实践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握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

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对这一经验的概括、总结和提升。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握其发展进程和内在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践创新,它既超越了苏联模式,又回应了全球化的挑战。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第三,必须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握其基本内容和相互贯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其发展逻辑是:以毛泽东为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起了奠基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内容涉及了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依靠力量、精神文明、一国两制、对外方略等诸多方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 21 世纪,特别是着重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概而言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一以贯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我们比较注意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分别的具体的研究,现在我们要特别注重其相互贯通和相互联系,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中来说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和新进展,这是当代中国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素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第五,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把握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一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并且强调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按照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保持其蓬勃发展的生机。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也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当今世界正在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深入人心,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

随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历史进程延伸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构成人们全方位、多层次探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和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及思想文化变迁的核心命题;也是人们理解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线索。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涵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实践之中。本章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历史起点问题及持续创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可以说,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已经逐渐超出了一般革命史与中共党史的界限,而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与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构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重要历史线索和理论依据;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实践中形成的理论成就的发展与归宿,体现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意义,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嬗变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评价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得与失,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及走向,无不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认识与把握的程度紧密相关。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意义已经成为重大的历史课题。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学者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认识和思想方法差异,因而在结论上也不尽相同。

回顾本世纪初叶,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兴起之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曾有过十分悲观的预测与评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翻版,因此它缺乏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基础和动力。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性质上相去甚远,因而由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只能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命运,不可能产生什么重大结果。^①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②。因此,“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③。然而,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却与人们的主观推断相反,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还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虽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曲折与艰难,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却在不断显现出来,并且最终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中去寻找答案。随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国内外学者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始于30年代,而是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初,这与毛泽东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所形成的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隐喻的外衣,用中国的例子来阐述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传统中挑选出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结合,那么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便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④。施拉姆指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

① 参见[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梁启超:《社会主义商榷》,1920年3月23日《时事新报》。

③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1991年7月20日。

④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

国革命作出了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①。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认为,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应持“相当审慎”的态度,不能过于简单化。他指出:“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是意味着中国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实际上说,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历史的自我意识终究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象”^②。

显然,一些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探讨比较注重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注重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把中国的国情条件与民族主义的情绪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由此出发,毛泽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或者说,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正统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人们还提出了“民粹主义”的影响等方面的论据。^③

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较早的研究者是李泽厚先生,他在反思历史过程中,力图在传统文化与社会因素的背景之中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艰难历程。还有些学者,在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巨大侵袭力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形”与“儒化”,认为所谓“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消融于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力量巨流之中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的推进,理论界的研究成果逐渐多了起来。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系统,揭示它们之间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时间跨度为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意义做出客观的研究和评述,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对中国革命、

①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 页。

②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234 - 235 页。

③ 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 - 118 页。